

■
柯群英 著

重建祖乡

新加坡华人在中国



重建祖乡

新加坡华人在中国

■ 柯群英

重建祖乡

新加坡华人在中国

阅 览



八方文化创作室

- | | |
|---------|--|
| 作 者 | 柯群英 |
| 企划编辑 | 何奕恺 |
| 责任编辑 | 冯婉明 |
| 封面/内页设计 | 何美娇 |
| 排 版 | 李丽芳 |
| 出 版 | 香港大学出版社
香港薄扶林道香港大学
www.hkupress.org

八方文化创作室
(世界科技出版公司之附属机构)
5 Toh Tuck Link, Singapore 596224
www.globalpublishing.com.sg |
| 联 络 | 65-64665775
chpub@wspec.com |
| 印 刷 | World Scientific Printers |
| 初 版 | 2013年6月 |
| 国际书号 | 978-981-4425-73-5 (pbk)(新加坡)
978-988-8028-82-5 (香港) |
| 定 价 | S\$22 |
| 版权所有 | ©2013 香港大学出版社 八方文化创作室 |

此简体中文版在中国、香港、澳门、台湾和澳洲由香港大学出版社独家出版和销售，其他地区由世界科技出版公司独家出版和销售。未经香港大学出版社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发行本书的任何部分。

中文版前言

自本书英文版2000年出版以来，海外华人与中国侨乡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密，与之相关的跨国纽带也得以进一步发展。这种关系也同样出现在中国北部地区，来自浙江温州、湖北、湖南等地的移民也开始回到侨乡帮助村镇建设。毫无疑问，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华人的宗族已经发展成为文化网络，覆盖散居海外的华人，有些华人有能力在海外建立华人共同体，而有些则依旧是孤立的个体。尽管如此，他们仍然视祖籍地为发源地。

跨国联系的强化是全球移民与回迁移民的结果，也出于移民帮助建设祖籍地的愿望（无论是富有的移民还是海外劳工）。中国依然有许多贫困的农村，移民还是当地人摆脱贫困的一种方式。一旦摆脱贫困，除了偿还债务，他们还期望回馈故里和重建家园，正如19世纪的移民所经历的那样。对于那些在海外发家的华人，除了帮助老家亲属就业，他们还被祖籍地的人们期望帮助重建故乡，捐资兴建学校、诊所、医院，兴修道路、桥梁和其他基础设施。因而，与旧时的乡村不同，侨乡繁荣兴旺，楼房掩映乡间。

本书一个关键的议题是探讨祖先崇拜与道义经济之间的联系，正是道义经济促使海外华人寻访故乡并帮助故乡重建。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政府逐渐放宽对宗教活动与祭祖的限制。祭祖被特别列为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与宗教相分离，因此没有受到政府的严格管控。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中国南方的广东福建两省出现了大规模的公祭活动。在广东省，富裕的香港侨民捐助了大量资金用于侨乡重建，并通过在主要乡镇设立工厂来振兴当地经济。乡村日益城市化，许多农业用地也被挪作它用。总的说来，广东福建两省日

益繁荣兴旺。城市化的进程已经深入到了农村地区，许多侨乡的农业用地被转为住宅或其他商业用途。以大规模的祭祖以及其他宗教庆典为表现形式的文化妥协，开创了切实可行的道义经济，使得侨乡受益于资本的流入。资本的流入推动乡村重建，使之转变为现代市镇。这种道义经济已经逐渐扩展到中国的其他地区，1970年后从当地移民海外的华人也同样重建并振兴了故乡。

移民的流动、循环和回迁以及海外华人的定居，已经影响到我们如何看待华人的身份认同。我认为海外华人将继续拥有多重身份认同，这一观点现今更加得以印证，因为华人们尝试去理解迅速变化的世界并在不同的政体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当华人置于流散中，他们面临着选择一组或多组身份认同。与此同时，他们也要面对着“家”以及哪里是家的问题。在这个找寻身份认同与家的过程中，我认为家和认同都处于同一个序列中，序列的一端是祖籍地，连接点处于另一端。个人决定自身的定位，无论他们的定位是更接近连接点还是源头，抑或是两者中间，都有助于我们理解个体如何看待自己的地位与身份。这种身份认同不一定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会随着背景与情境的转变而变化。

本书旨在填补一个重要的学术空白——尝试去了解一种跨国的群体关系，这个群体被时间和空间分隔，但却因共同的记忆与情感在变化的中国政治气氛的鼓励下而重新聚合。在这个重新聚合的过程中，海内外华人重续亲属关系并重建文化认同。他们将宗族关系建立为一种跨国文化网络，并将散落在各个连接点的海外宗亲与发源地连接起来。

在21世纪，跨国文化网络变的日益重要，不仅是因为它以有形的方式把海外宗亲与起源地连接起来，更因为它已经成为一个资源网络，使得成员们可以通过多元方式进行交流沟通，而不再局限于传统的面对面互动和接触。海外华人利用网络空间，twitter空间以及电信等新兴媒体空间进行互相沟通，不管他们的沟通是出于什么目的。在这个意义上，跨国文化网络为个体搜寻信息提供了一个想象的空间，它也为华人表达对故乡以及现居地的情感提供了一个空间，展现了海外华人的侨乡成员地位和移民身份；也展现了他们在新政体中获得的新的认同和公民身份，以及作为全球公民的认同。以上这些都为我们理解侨乡与海外华人之间关系的复杂性，以及处于两地中的个体，提供了新的研究空间与挑战。

柯群英

2012年6月

鸣谢

我感谢香港大学出版社对本书中文版顺利出版的大力支持。

我得益于很多人的帮助，让我有机会开展此项研究工作并撰写此书。在这里，我想表达我对新加坡以及福建安溪受访者的感谢，多谢他们在采访中的开诚布公以及对我多次访问的不厌其烦。他们的回答恰如其分。为了保护受访者的个人隐私，书中出现的名字都已作了一些改动。

此外，我要多谢香港大学以及同事们对于我的支持。我特别要感谢王赓武教授与凯博文教授 (Arthur Kleinman) 给我的支持。还要感谢三位审阅者对本书提出的宝贵意见以及对出版的支持，他们分别是赵文词教授 (Richard Madsen)、华琛教授 (James Watson) 与阎云翔教授。我同时还要感谢香港大学出版社社长 Michael Duckworth 对这项研究工作的全力支持与耐心。程希将原英文版翻译为中文，金红和高崇帮助润色中文表达，使得重点突出，观点明晰，应晓非因应此次中文版本需要，更新了相关的数据，还有柯建源为此版本提供了一些摄影图片。

最后，我要感谢家母和已故的家父，多谢他们一直以来的耐心帮助，他们为我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感谢我的丈夫以及我们的女儿，他们的不懈支持使我的学术追求之路充满了欢乐。

自不待言，本书中的不足之处均为我个人的责任。

版权声明

本书作者感谢以下学术期刊与出版社允许本书刊登以下文章的节选部分:

1. 第5章, “Rebuilding Their Ancestral Villages: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Singapore Chinese” in Wang, G.W. and Wong, J. (ed.), 1998,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Press and World Scientific, pp. 249–275.
2. 第6章, “The Changing Moral Economy of Ancestor Worship in a Chinese Emigrant Village”, in *Culture, Medicine and Psychiatry*, vol. 237, 1999, pp. 99–132.
3. 第9章, “Doing Anthropology within a Transnational Framework: A Study of the Singapore Chinese and Emigrant Village Ties” in Cheung, S. (ed.), 1998, *On South China Track*,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p. 81–109.

地图和表格

地图

- 48 ▪ 地图1 福建省的乡镇和都市
- 49 ▪ 地图2 安溪县的行政区
- 50 ▪ 地图3 安溪县的蓬莱镇和乡村

表格

- 78 ▪ 表4.1 基于亲戚关系了解的感情强度
- 99 ▪ 表5.1 受教育程度的性别比例
- 99 ▪ 表5.2 各年龄段的受教育程度
- 140 ▪ 表6.1 干部对祖宅和祭祖活动的态度
- 140 ▪ 表6.2 不同级别干部支持祭祖活动的理由

图表

- 205 ▪ 图表1 宗族网络：起源地和连接点之间的关系
- 207 ▪ 图表2 宗族内部网络以及个体和起源地的关系
- 209 ▪ 图表3 宗族间网络以及与起源地的关系



目录

vi	▪	中文版前言
viii	▪	鸣谢
x	▪	地图和表格
1	▪	第一章 导论
25	▪	第二章 建构新加坡华人文化认同
47	▪	第三章 祖乡在安溪
63	▪	第四章 建构集体记忆和社会经历的纠结
89	▪	第五章 重建安溪祖乡的道义经济
117	▪	第六章 祖先崇拜的维系
147	▪	第七章 宗教复兴
169	▪	第八章 重修族谱与找回个体文化之根
191	▪	第九章 华人宗族作为文化网络：一个范式
213	▪	第十章 结论：从宗族到跨国华人网络
221	▪	参考书目

第一章

导论

引言

本书研究的是两个华人群体，即移民到新加坡的安溪华人及留在福建省安溪的侨乡村民之间的关系。本研究考察了新加坡华人如何造访安溪寻根问祖，探究文化本源，开展祭祖活动，实现华人宗族的复兴。安溪县是著名的移民迁出地，也即侨乡，在19世纪以及20世纪的上半叶，许多人从这一地区迁移到世界各地，尤其是迁移到东南亚。该研究主要考察的是柯氏宗族溪头成员和新加坡宗亲之间的关系。

自本世纪90年代初以来，对于侨乡和海外华人族群的研究兴趣与日俱增。然而，一些著述多侧重“海外华人”如何回中国故乡寻根访祖，而少见针对海外华人与侨乡之间关系的系统性研究。

本书侧重回答这样一些问题：为什么新加坡华人仍然关心他们先辈的故乡？为什么新加坡华人，尤其是那些出生在新加坡的华人，会参与到祖乡的生活，社会经济重建，以及传统文化复兴？本书以此对道义经济的形成进行了探讨，提出正是道义经济的运作使得侨乡在当地成为繁荣富裕的村庄。

该问题的关键是，集体记忆如何成为推动新加坡华人回访祖乡的重要力量。通过集体记忆，新加坡华人复兴了宗族，重塑了他们的社会文化和宗教角色。新加坡华人对侨乡事务的参与，使得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宗亲结构，及其在当代新加坡城市社会和中国农村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这一问题将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有所讨论。本书还将涉及的另一问题是，道德责任感是如何帮助新加坡华人在中国乡村环境中重新定义自己的角色。

在大的概念层面，本书的探讨并不局限于新加坡华人与侨乡的关系，而是试图将这一关系与其他地方的华人族群现象联系起来。

最后，本书还将探讨在文化网络中，新加坡华人与侨乡关系所处的位置，以及华人宗族是如何从一种狭隘的结构转变为跨国网络结构。

建立道义经济

为什么新加坡华人会感到从道德的角度来讲，他们需要资助故乡的发展？要了解他们的动机和目的，我们需要探讨他们对故乡的认识、认同以及与“老家”的密切关系，我们还要了解他们对道德责任感的理解和他们道德意识所处的层次。我们需要从代际的角度来进行研究，以更好理解新加坡华人与侨乡亲戚之间关系的延续和断裂。因此，我们也需要理解安溪人，以及他们是如何建立一种（社会）环境，维系新加坡华人与故乡的关系，启动和维持道义经济的运作。

从代际角度来看，移居新加坡的移民仍然对祖乡怀有深厚的感情，这包括绝大多数的第一代移民。这些移民觉得自己负有道德义务去资助老家的直系亲属。他们还特别热心于资助家乡的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参与家乡的社会宗教活动。即使是在政治高压的年代，他们也想方设法给老家的亲戚寄钱、药品或其他物资。这背后的原因之一是他们深刻了解老家的贫穷。安溪，在历史上，一直是中国最贫穷的地区之一。

那些在新加坡出生的安溪华人后代又如何？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祖乡，感受到何种道德要求？一般认为与上一辈相比，新加坡出生的华人对先辈的故乡没有太深的感情和太大的兴趣，因而也不太可能资助祖乡的建设与参与祖乡的活动。根据这种看法，他们不认为祖乡对他们来说有任何重要的意义，仅仅是祖先起源的地方而已。因而不想与它有更多的瓜葛。

然而，实际情况是，在新加坡出生的安溪后裔对先辈的故乡怀有浓厚的兴趣。相当一部分人拜访过故乡，并参加过那里举行的各种社会宗教活动。他们也为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这由于几个方面的因素导致。首先是新加坡宗族组织足够强大，能够把年轻一代约束在基础亲属关系网络中。宗族中年轻人之间的相互交往和他们之间的联系纽带，反映宗族内部已经聚集了相当一部分年轻人。他们在长辈

的带领下参与在祖籍地举行的活动。另一个因素是家庭的凝聚力。长辈们经常鼓励年轻一代到安溪老家探亲，参与或资助当地的建设。最后，近年来，新加坡安溪会馆也积极鼓励年轻一代参与在祖籍地和安溪县举行的活动。

在侨乡，安溪人有意识的利用现有的社会宗族关系，从新加坡亲戚中获取金钱和财物。他们利用道德说教和感召，鼓励新加坡华人更多地参与村里的事务。通过与新加坡亲戚叙旧以及强调新加坡亲戚对他们负有的道义责任，安溪村民触及了新加坡人的情感痛处，尤其是他们的负疚感，并以此建立基于道德责任感的道义经济。

与此同时，安溪人还大张旗鼓地宣传新加坡亲属对故乡所作的贡献。通过这些表彰，安溪人进一步巩固了道义经济。

然而，道义经济并非是和谐的。其间交织着这两个华人群体之间的紧张对立、利益冲突、争执甚至怨恨。年轻一代的新加坡华人对不睦和怨恨的感受往往更为强烈，因为，正如一般的看法所认为的那样，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属于祖籍地。

集体记忆与怀旧情感

本书要探讨的第二个主要问题是新加坡华人的集体记忆以及他们对故乡的感情。这在移居新加坡的老一代华人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许多人无法或者不愿抹去对老家的记忆，并把这些记忆传递给了儿子、孙子、甚至重孙子。早年在中国老家的经历，演化成了他们以及他们后代所共有的集体记忆。

我在这里所关心的是群体的社会历史记忆。根据里高夫 (Le Goff) 的说法，记忆是任何个人和集体认同的基本元素。每一个社会都有它自己的记忆方式。一些澳大利亚和非洲部落社会没有任何文字记载，而只有以歌谣和传说形式流传下来的口述的集体记忆。另一些社会则将它们记忆用文字记录下来，以供当时的人们以及后人借鉴参考。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和集体记忆也在发生变化。由于社会条件和各个历史时代的需求不同，集体记忆经历了从神化到世俗化又到理性化的演变过程。一些社会对神话和宗教活动的热衷，导致了对神性观念以及宗教结构和仪式的格外重视。这些大多被载入了社会的集体记忆中 (Le Goff, 1992: 58-64)。

记忆也是一种主观的思维过程。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正是个人经历的事件和情景构成了个人的记忆。这些记忆通过各种方式传递给他人，包括：日记、信件、讲故事或其他口述形式。那些没有以任何形式记载下来的事件就永远消失 (Watson, R., 1994: 8)。这些是个人记忆，除此之外，还有集体记忆。按照哈尔巴沃斯 (Halbwachs) 的看法，“虽然集体记忆能够持续下去并从某一个固定的群体中吸取能量，但是作为群体成员的个体才是记忆的主体” (Halbwachs, 1992: 22)。因而，在一个社会里，有多少群体和个人，就有多少集体记忆 (Halbwachs, 1992: 22)。集体记忆通常是一个群体内，个体所共享的经历，成员记住事件，意思是说，尽管他们没有亲历这些事件，但是非常熟悉这些事件的表象和象征。这些事件往往通过各种形式——历史记载、传说、绘画、仪式、诗歌、音乐、照片和影片等被再现 (Watson, R., 1994: 8)。

对事件的记忆从来不是系统性的。其表现既无逻辑性，个体也通常不会对其加工形成知识。因而，集体记忆的再现——无论是以直观的形式，如纪念碑、绘画及仪式，还是以文献的形式，如日记等——都是碎片化的。然而，当寻求影响祖先的生活、社会，以及国家的事件时，记忆为群体提供可仰仗的表象。通过思考，想像关键历史时刻的集体事件，集体记忆使得人们能够重构集体的过往——群体认为他们所属于的过往。然而，历史和历史事件并非也不应该被看成是一个个独立的快照。正是事件和其表现的流动性，才使得相应表象和象征浓缩成为集体记忆。历史在不同场合，从公开的、秘密的到个人的，记录了对记忆的解释，但是记忆仍旧存在于个人的层面。

集体记忆取材于基于特定社会环境的个人记忆的集合。因而，集体记忆也是一种社会的记忆。然而，它是个人理解的产物，受个人和随时间而变化的各种解释的影响。因此，我们不难看到经常会有各种不同版本的集体记忆。

历史和社会的记忆帮助人们建立与过去有关的自我、在过去和现在日益脱节的当今社会，为人们提供寻找自身身份认同的港湾。记忆提供将过去、现在与将来延续起来的纽带，通过借鉴过去和现在的事件，帮助个人和群体建立当前的行动，允许个人和群体利用现有的知识和回忆追求未来的目标。因此，新加坡安溪华人记得他们的祖籍地和家乡，以及那里发生的社会事件，这些记忆帮助他们定义“他们是谁”“他们从哪里来”，并且推动他们对祖籍地提出的请求做出回应。因为“虽然集体记忆能够持续下去并从

某一个固定的群体中吸取能量，但是作为群体成员的个体才是记忆的主体”（Halbwachs, 1992: 22），个体的记忆必须置于相关社会群体的思想中才具有意义，并且与群体中的所有人相关。在许多没有文字记载传统的社会里，存在着“记忆专家，专司记忆的人”，他们类似于“系谱专家、王朝法律书籍的监护人、宫廷历史学家、传统主义者”（Le Goff, 1992: 56），他们主要的使命就是，通过不断提醒成员他们所具有的共同性来维持群体的延续。里高夫将此视为“族群记忆”（Le Goff, 1992: 55），认为“记忆的积淀是个人日常生活的内容之一”（Le Goff, 1992: 55）。

在集体记忆中，家庭在建立记忆种类的框架及传递记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某些行为和观念被反复传递给家庭中的成员，从而深深印入了人们的脑海中并得以在日后需要时再现，这部分地涉及到对过去的重建。

集体记忆的重要性在于它在一个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记忆不仅有助于人们理解某些过往事件，也能使人们更好地认识现在的事件。集体记忆也被看成历史事实，体现了一系列曾经被社会所认可的价值观。虽然有些价值观仍被有关群体所信奉，但有些则已经被抛弃。然而，人们可重新发明集体记忆，致力于重建传统价值的努力可帮助群体应对社会变革。

记忆还被视为是权力的手段和目的。正因如此，争夺记录和传统的主导权的斗争常常涉及到对记忆的操纵（Le Goff, 1992: 92）。当代社会有意识的、有目的的选择重构或审查记忆的类型，来确立权威或某人地位的合法性。哈尔巴克斯认为集体记忆的最初保存工作主要由精英阶层来完成，他们遵从根深蒂固的传统，处于阶层体系的顶端。由于是精英们的集体记忆主导了社会，那么也就是精英的社会价值观在支配着社会。然而，一旦非精英群体跻身精英阶层，社会就需要在某种程度上重组和调整其记忆的框架，或者是歪曲历史，或者是限制记忆的领域，目的是剔除（某群体）不希望再现的记忆内容。随着新的精英们要求将他们的行为和价值观注入集体记忆，记忆的重塑通常必不可少。在这一过程中，不难看到遥远的过去被遗忘，而与现实相符的历史则被强调。

另外，哈尔巴克斯认为当某一群体获得了较高的声望，并且被全社会所认可时，这一群体以及他们的活动被认为是为整个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Halbwachs, 1992: 138）。因而，有关这些人的贡献，包括社会政治经济贡

献，以及慈善的方式的集体记忆，是以社会对其评价为基础的（Halbwachs, 1992: 144）。在传统社会，这通常与精英乡绅阶层相关，涉及这些内容的机构已经建立。因而，精英群体的道德传统也是既有社会价值观体系的组成部分。为此，哈尔巴克斯认为，富人通常要担当起向穷人灌输道德观的责任，因为穷人没有自己的道德传统。然而，随着社会秩序的变化，传统道德常常受到新贵们的挑战。新的道德观会由此应运而生。新贵精英们包括工匠、商人、各色人等。如今，从村民中产生的道德传统，也是重构中国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

在现代社会，有关富人品德的说法是，每一个家庭的领导者都是通过自己的努力积累了财富，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证明富人地位合理性的策略性说法。在很大程度上，哈尔巴克斯把财富的规模等同于可感知的个人价值的规模，财富拥有者的道德价值可以通过这种等同来考察。然而，个体和他的品性必须经受一段时间的考察后，社会才能对他的贡献作出评估。因此，对社会的贡献，而不是所拥有的财富的规模，才是个体道德地位的基础。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后，如果他的品行和贡献仍能够在社会记忆中留下烙印，此人或一个阶层的遗产就会在记忆中永存。在传统社会，头衔的赐予是对可取的社会品性和道德的承认。

新的财富和新的精英的出现会带来什么？在新的道德传统中，财富仍旧是重要的社会资本，拥有财富，不管其职业为何，都意味着较高的社会地位。新的精英阶层成员并不符合传统的成功定义，但财富和金钱现在成为重要的评判成就的标尺。他们因此需要改变现有的社会秩序，建立新的精英空间。同时，新建传统还必须承认他们是新的成功的精英。

无法避免的是，对传统的调整和创造新的传统会导致与现有传统发生冲突。传统与道德二者之间的关系也会受到质疑。在哈尔巴克斯看来，旧的传统通常仍被视为合乎道德的，而新的传统则是不道德的，或者最多不过是功利主义的道德而已。在一个商业活动日益兴盛的社会，功利主义的道德被新的精英们所采用，为他们的商业活动和赚钱行为作辩解，但它也预设了反哺社会的必要，如通过慈善行为等，这其中可能也包含利他的因素。

当社会发生变化时，社会被迫需要采取新的价值观，这涉及寻求另外的集体记忆和社会价值框架，以建立新的传统和社会价值新秩序。除了业

已在社会中占居主导地位精英们的传统和集体记忆之外，来自不同群体的，另外的集体记忆变得重要起来，这些群体既包括新的精英群体，也包括各种现有的社会群体如宗族的、家族以及少数民族群体。这些群体开始竭力展示自己的存在，并要求将他们的记忆和社会历史融入到主流的社会思想发展过程中。

因而，人类学关于集体记忆和怀旧的论述，有助于我们理解某一正试图重新探究其文化之源和文化认同的群体——不论是家族、宗族、还是少数民族群体。我们可以将对记忆的追寻看成是一个整体地和复杂地促进和维护文化构成的过程。库克勒和梅列 (Kuchler and Melion) (1991: 7) 认为记忆具有如下特点：

1. 它是一个积极建构的社会文化过程；
2. 它通过表象运作；
3. 记忆的形态基于历史，而理解也是历史性的；
4. 忘却和记住均为记忆的功能，忘却是一个选择性的过程，通过此过程记忆获得社会文化的维度 (Kuchler and Melion, 1991: 7)。

记忆可以在哲学探寻的过程中被唤醒和激活，但是记忆本身不能形成这个过程 (Kuchler and Melion, 1992: 3)。因而，理解经历形成和重塑集体记忆的方式具有重要意义。例如，怀旧被认为是对现实处境不满的反映。这种不满促使个人将过去和过去的事件理想化。通过转向一个理想化的过去，一个人可以即刻摆脱直接的，并不太迷人的现实 (Nosco, 1990:)。因此，怀旧是集体记忆允许个人或社会群体再造过去，以满足现实中的认同和互动需求的一种方式。

在理解记忆和回忆时，事件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是那些从事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学者们所探究的主要问题。有关这一问题已有大量著述问世。然而，本书的目的并非是要对记忆的内容和记忆的准确性进行科学的论述。相反，我们感兴趣的并不是什么是“真实的”，而是回忆的过程和那些被回忆为重要的事件、形象和表现。这涉及到选择的问题 (Fentress and Wickham, 1992)。

在这其中妇女担当的角色尤为重要。杰瑞 (Geary, 1994) 认为，有必要研究“女性的记忆”，因为正是她们积极的记住，保存和传递历史。正是通过保

存、建构和铸造记忆的活动，过去以及与之相随的制度能够被记录下来，它的机制得以流传至今。这里，作为记忆者的妇女和留在人们记忆中的妇女，都应当受到关注。虽然作为记忆者的妇女在集体记忆的领域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在父权社会中，妇女本身的地位则卑微低下，能够留在人们记忆中的妇女更是凤毛麟角。与文字记载相比，关于妇女是否在口述史中具有突出地位，尚有待于进一步考察 (Geary, 1994: 51-73)。

妇女在记忆中所担当的角色与记忆的职业化有关。口述在过去和现在都是向下一代传输记忆的重要方式，从个人和家庭角度来说尤其如此。而宗族或其他的社会层面则更倾向于建立一种具有坚实基础的记忆。口述因而让位于男子所主导的文字记载。族谱是将正在发生的事，用官方的文字形式记载下来并将留传给下一代的记录。文本具有很高程度的准确性，对后代来说，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些关于过去的档案和记载，能使我们再现历史并且激活与它们有关的记忆，以此贯穿过去和现在。这形成了记忆发展的两个分支。其一是正统的记忆，以族谱和文字记载为代表。另一支就是个人或者民间通过口述代代相传的记忆。正统和非正统的记忆可能是一致的，也可能出现分歧。二者的一致和分歧表明，不同群体在有意识的记忆过程中，侧重记忆的内容有所不同。内容的选择受集体记忆形成时，当地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环境的影响，当然，也受群体在社会中所处位置的影响。

在人们的日常谈话中，从讲故事到对文化内容和习俗惯例的复述，都是个人版本的记忆。显现的是个人能够选择和记住的，个性化的和片断的叙述。它们以传说、回忆以及讲故事等的叙述形式出现。一般只在亲戚网络中流传，年轻人从老一辈的口述中获得这些记忆。这些讲述已经成为新加坡早期移民口述史的一部份。

对集体记忆的分析，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移民对其故乡的感情和依恋，也有助于我们理解第一代新加坡华人探访故里的渴望，以及他们资助故乡重建的动因。

新加坡安溪华人和他们的集体记忆

新加坡安溪华人的集体记忆是与他们对祖籍地的共同理解、过去的经历以及现在的心愿联系在一起的。其中关键的是他们对于延续文化认同的